

枚,有领瑗1组7枚。各组玉质玉色相近,尺寸则依次递减。如上述分组无误,这就是目前所知商代唯一可被认为是“列璧”的例子,尽管尚不能确知各组璧之数量的含义,但“列璧”象征身份应该无疑。而且数量为4、7、8之“列璧”各有2组,其极数为9,这也许是商代王后所可享受“列璧”之玉璧数量的极限。

在殷墟,无论墓葬规格多高,一般每人只使用一枚牙璧,这是迄今考古所见事实。郭家庄 M160 随葬牙璧,形制规整,形体较大,无使用痕迹,应属礼器。小屯 M5、花园庄 M54 等出土牙璧,形体较小,有明显的系绳磨蚀痕迹甚至缺口,或系佩饰。

据现有考古成果,在殷商时代,墓葬等级与玉璧数量、质量、规格息息相关。墓葬等级越高,璧的数量越多、质量越好、规格越高。绝大多数普通墓葬,不具备使用玉璧的资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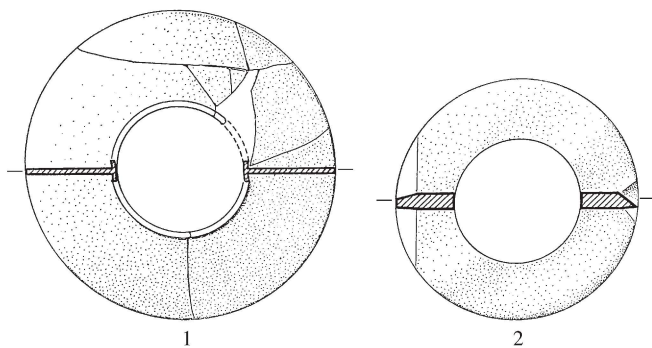
就考古发现而言,殷商玉璧以平板璧为常见型,小型墓葬通常只用小型平板璧。有领璧则主要见于较高等级墓葬和王室祭祀场。但,无论使用多少有领璧,都同时伴有平板璧。可能,平板璧和有领璧的具体功能有所不同。

作为王陵的 M1001,其玉璧材质有石多玉少现象,似不符合商王身份。其实,王陵中的出土器物,很多属于殉葬人所有,只代表殉葬人身份等级。出土的 M1001 之璧,并不能肯定都属于墓主人。

若按《周礼》关于玉瑞和玉器的划分,殷墟墓葬中作为礼器的玉璧,可以看作兼具玉瑞和玉器双重性质。即就死者本人而言,它们是生前行礼之玉瑞;而就死者亲属而言,则是献于死者的玉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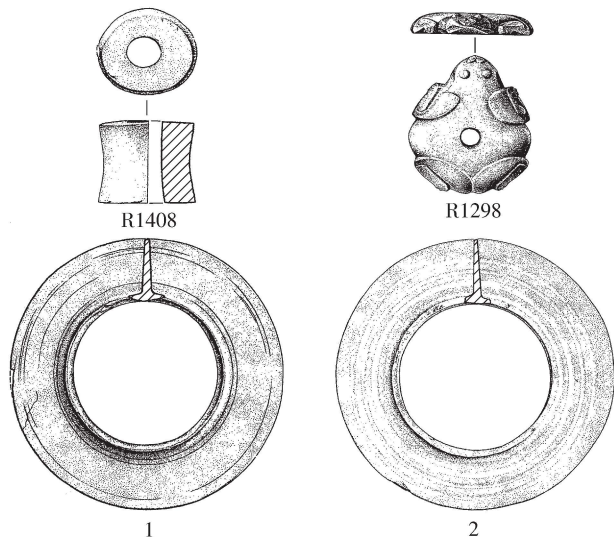
2. 装饰用璧

侯家庄 M1001 号大墓出土有 2 件小玉坠,形如璧,但体量很小,中孔之外还有更细小之边孔,可用于系挂。发掘者疑“或为耳坠之



图二二 殷墟祭坛(丙一基址)出土玉璧

1. 白璧 2. 苍璧



图二三 殷墟 M1550 殉葬坑出土玉璧组佩

1. M1550 : 40 2. M1550 : 49

类?”^[45]该墓翻葬坑出土牙璧 R1314,肉部残存一个小系孔,应属装饰品。

妇好墓和花园庄 M54 出土牙璧,中孔皆有长期穿绳系挂形成的磨蚀沟槽,应曾用作佩饰。

殷墟西区 GM239 出土玉璧,近边缘有一小孔可用于系挂,应是佩饰。

孝民屯 NM137 : 17 石璧在胸部,应为佩饰。

3. 丧葬用璧

苗圃北地 M15 : 10 玉瑗,直径 3.1 厘米,出于死者口中,为玉珞。

戚家庄殷墓 M162 死者为儿童,口含“玉

环”。M216 随葬玉璧亦为口琚。M30 随葬玉璧在左手旁,应为玉握。

孝民屯殷墓玉璧 NM137 : 31、SM68 : 1,为玉握。玉璧残块 SM871 : 10,为玉琚。

(三)甲骨文和金文有关记载

在殷墟卜辞和铜器铭文中,璧是行礼之重要礼器。

卜辞有以璧祭祀祖先、入璧、征璧的记载,除了前引《花东》涉璧诸辞条外,还有:

《花东》37.5“癸巳卜,子禳夷白_𠄎肇丁?用。”

《花东》180.2“甲子卜,乙,子肇丁_𠄎累取?”

《花东》198.11“子肇丁_𠄎?用。”

《花东》475.2“乙在巳卜,夷_𠄎?用。乙巳卜,夷琅。”

《村中南》364.1“甲戌卜:于_𠄎来_𠄎羊百、辛牛百、黄_𠄎五。四五”

金文中有以璧为赏赐物的记录。如《虢季子白盘》铭文曰:“子赐虢季子白_𠄎一,虢季子白用作丁师彝”。(《集成》5373)

综上,殷商玉璧具有礼器、生活用器(佩饰)、丧葬用器三大功用。一般而言,直径约为3、4厘米者,可能不具有礼器功能,而是装饰品,或作丧葬所用玉琚、玉握。所谓“玉纺轮”为捻线工具说,尚未得到科学验证。

形如璧而体量小的玉器,在商代有专名曰“章”,其相关问题已有另文讨论^[6]。

- [1] (宋)吕大临《考古图》卷八《考古图·续考古图·考古图释文》,第143页,中华书局,1987年。
- [2] (宋)聂崇义纂辑《新定三礼图》卷一〇“玉瑞图”、卷一一“祭玉图”,清华大学出版社,2006年。
- [3] (清)戴震《考工记图》卷下,第73、77页,商务印书馆,1955年。
- [4] (清)吴大澂《古玉图考》,中华书局,2015年。
- [5] 夏鼐《商代玉器的分类、定名和用途》,《考古》1983年第5期。
- [6] 梁思永(未完稿)、高去寻(辑补)《侯家庄·第六本·1217号大墓》,第47页,插图二一,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,1968年。
- [7] 梁思永(未完稿)、高去寻(辑补)、石璋如(校补)《侯家庄·第九本·1129、1400、1443号大墓》,第39页,图版二〇:6,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,1996年。

- [8] 同[7],第50、51页,图版一〇:1;第48、49页,图版二一:2;第51页,图版二〇:5。
- [9] 梁思永(未完稿)、高去寻(辑补):《侯家庄·第八本·1550号大墓》,第49、50页,图版四一:4、9,四〇:3,四二:1,插图二三,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,1976年。
- [10] 梁思永(未完稿)、高去寻(辑补)《侯家庄·第二本·1001号大墓》,第128~134页,插图六三~六五,图版一一九~一二六;第133~134页,图版一二五:11、10,一二六:7、6;第133、134页,图版一二五:12、13,一二六:8、9,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,1962年。
- [11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《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》,第113、114页,图90:2、1、6、5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1998年。
- [12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《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》,第180~183页,图一三五:9、5、7、8,拓片三五、三四,图版三四:1,图版三六:2、1,图版三九:1,科学出版社,2007年。
- [13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《殷墟妇好墓》,第118~122页,图六九:5,彩版一五:1,图版八五~九四,文物出版社,1980年。
- [14] 同[13],第122页,图版八六:4,图版九三,2。该器造型古拙,与山东、辽东地区乃至科尔沁草原出土的史前玉牙璧形制相同。
- [15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《殷墟玉器》,图版10、15,文物出版社,1982年。
- [16] 同[13],图版九五:2,图版一〇〇:4,图版九六:2。
- [17] 同[13],第121页,图版九三:3下。
- [18] 石璋如《小屯·第一本·遗址的发现与发掘·丙编·殷墟墓葬之三·南组墓葬附北组墓补遗》第56页,图版三六、三七,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,1973年。
- [19] 石璋如《小屯·第一本·遗址的发现与发掘·丙编·殷墟墓葬之五·丙区墓葬》上册,第124、125页,下册图版八八:4,图版八九:3,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,1980年。
- [20] 郭宝钧《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》,《中国考古学报》第五册,第27页,图版九:一、二;第33页,图版一一:二,1951年。
- [21] 同[20],第51页。
- [22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《1976年安阳小屯西北地发掘简报》,《考古》1987年第4期。
- [23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《1969~

- 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》，图七二：6，《考古学报》1979年第1期。
- [24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《殷墟发掘报告》，第253页，图版七〇：3上，文物出版社，1987年。
- [25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《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》，《考古》1993年第10期。
- [26]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《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》，第55页，图三一：2，科学出版社，2011年。
- [27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《1980~1982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》，《考古》1986年第2期。
- [28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《1984年秋安阳苗圃北地殷墓发掘简报》，《考古》1989年第2期。
- [29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《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南地的两座殷墓》，《考古》1989年第7期。
- [30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《安阳大司空——2004年发掘报告》，第379页，图三五四：1，图三五四：2，图三五四：3；第439页，图四〇六：4，文物出版社，2014年。
- [31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《安阳孝民屯（四）殷商遗存·墓葬》，图2-119J、图2-136D、图2-278C、图2-239、图2-401C、图2-424B、图2-424B、图2-281B，文物出版社，2018年。
- [32] 安阳市博物馆《安阳铁西刘家庄南殷代墓葬发掘简报》，《中原文物》1986年第3期。
- [33]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《安阳殷墟戚家庄东商代墓地发掘报告》，第66-68页，表二，彩版一六：2左4；图一七三：4，彩版一六：2左5；图一七三：5，彩版一六：2左1；图一七三：6，彩版一六：2左3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。
- [34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《安阳殷墟出土玉器》，第3~5、7~9、44~53、60页，科学出版社，2005年。
- [35] 石璋如《小屯·第一本·遗址的发现与发掘·乙编·建筑遗存》，第173页，插图六二，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，1959年。
- [36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《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》，第1574页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。
- [37] 刘一曼、曹定云《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考释数则》，《考古学集刊》第16集，科学出版社，2006年。
- [38] 李学勤《关于花园庄东地卜辞所谓“丁”的一点看法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04年第5期。
- [39] 刘雨《商和西周金文中的玉》，《故宫学刊》创刊号，紫禁城出版社，2005年。
- [40] 严志斌《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》，第339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；严志斌《商金文编》，第10页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6年。
- [41] 同[35]，第332页。
- [42] 杜金鹏《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》，第366、367页，科学出版社，2010年。
- [43] 同[35]，第173页，插图六二。
- [44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《殷墟的发现与研究》，第330页，科学出版社，1994年。
- [45] 同[10]，上册第133页。
- [46] 杜金鹏《说璋——殷商玉器名实考之七》，《学而述而里仁——李伯谦先生从事教学考古60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文集》，大象出版社，2022年。

（责任编辑：杨冠华）